

鲁杰原则与“作为责任的主权”

——以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为例^①

【尼日利亚】爱德华·奥桑·奥比

【内容提要】当前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环境破坏、经济停滞和社会失序，这是企业相对于无数本土族群或语言群体的优势地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这一优势的确立也是因为相关国家机构的监管缺失。鲁杰原则（Ruggie Principle）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和公司之间的分割，用以消除企业经营活动在人权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民众。

【关键词】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鲁杰原则；发展中国家安全；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爱德华·奥桑·奥比（Edward Osang Obi），尼日利亚社会与企业责任中心执行主任。

导 言

在过去的 40 年里，自然资源的开采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分配不当，

^① “鲁杰原则”（Ruggie Principle）即《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是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哈佛大学的约翰·鲁杰（John Ruggie）教授于 2008 年提出的，该系列指导原则主要用于约束跨国公司与当地社会关系。——译者注。

使得尼日利亚成为一个有着“灾难性发展经历”的典型国家。^① 1960年独立时,尼日利亚是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中,尼日利亚获利甚丰,此后却逐渐陷入经济困境,竟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标中排名倒数的国家之一。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慨叹“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败或毁于一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决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他试图弄清楚人类历史上这一反复出现、难以捉摸的现象,奥尔森指出:“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古代帝国的崩溃原因……就不会有那么多与此相反的‘神秘’兴衰史引起历史学家长期不断地探索了。”^② 在经济学研究中,这种神秘的、尚无法准确解释的衰败,常被用来解释这些资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发展失败。^③ 直至最近,尼日利亚一直被视做持续衰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停滞的典型。尽管目前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充斥着大量的技术官僚,丰富的自然资源似乎使得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仍将是政治阶层关注的焦点,最为明显的表现是肆无忌惮的权力寻租行为。

由于社会制度的脆弱性,寻租行为带来了资源经济学中所说的“贪婪效应”(voracity effects),即“利益群体将它们的精力集中于获取经济租金”。^④ 这种效应,“其特征是对于资源控制的争夺,产地要求获取资源的更大份额,而其他贫穷地区则要求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两种要求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其中伴随着猜忌、信息不畅、缺乏透明度

① Xavier Sala-i-Martin and Arvind Subramanian, "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804, May 2003, p. 4.

②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2.

③ Claudio Bravo-Ortega and José De Gregorio, "The Relative Richness of the Poor? Natural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WPS3484, 2005.

④ Claudio Bravo-Ortega and José De Gregorio, "The Relative Richness of the Poor?" p. 2.

以及责任的不确定性。”^① 过去几十年里，这一政治经济分裂所导致的累积效应，已经造成并将继续使这个国度处于本国精英的重重包围之中。众所周知，资源分配所导致的分歧将会造成持续的长期冲突，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就是一个例子。奥尔森的著名观点“那些政治不稳定或者时常遭受外来入侵的社会可能会投资较少、发展速度较慢”，这同样适用于尼日利亚，他还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会发生更多的资本逃逸，而回报较慢的工厂设备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少。财富积累将是以一种很容易随时带走，但却不利于社会财富积聚的方式。”^② 尼日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领域已经出现类似情况。克劳迪奥·奥尔特加（Claudio Bravo-Ortega）和乔斯·格雷戈里奥（José De Gregorio）指出，其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他们认为“人力资源的分配在这种经济中是扭曲的，资源被转移到没有收益的活动上”，这也印证了奥尔森的观点。^③

一 矿业政策

我们认为，当前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环境破坏、经济停滞和社会失序，这是企业相对于无数本土族群或语言群体的优势地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这一优势的确立也是因为相关国家机构的监管缺失。而且，这是尼日利亚国家与该地区石油行业内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核心。我们需要从历史视角来理解这一相互依赖，尤其是殖民时期经济政策（尤其是矿业方面），因为它是当前法律和制度框架的根基所在。不同殖民国家创办殖民地企业的原因是不同的。理解这一点，能使我们管窥它们不同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法国为了弥补自身相对较少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因此对于殖民地采取扩张主义态度；而英国和德国则不愿意为殖民地的运转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用本土税收来为殖

① Ehtisham Ahmad and Raju Singh,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Revenue Sharing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llustrations from Nigeria," *IMF Working Paper Series*, WP/03/16, January, 2003, p. 3.

②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pp. 4 - 5.

③ Claudio Bravo-Ortega and José De Gregorio, "The Relative Richness of the Poor?" p. 2.

民地管理埋单。^①

为了使这些殖民地能够自给自足,同时尽可能有利可图,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所有的矿产和土地权攥在自己人手上。^②这一法律环境就决定了最初创办这些公司的性质特征,它们注定只能是属于英国人的,全尼日利亚概莫能外。^③这一对于英国人利好的,甚至是未雨绸缪的法律框架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公司同殖民立法者之间的密切关系。^④锡是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开采出的第一种矿产资源,而殖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态度也折射出了他们当时对尼日利亚民众和资源的态度,即制伏、压制并剥夺他们的土地和资源。^⑤正如詹姆斯·莫里森(James H. Morrison)所提到的,第一步是以武力制伏土著人口,然后再确立殖民者对于土地和资源的法律所有权,而丝毫不顾及当地民众对这些资源的诉求,这里很有必要引述莫里森所提及的英国殖民行政官员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的话,“唯有欧洲科学与资本才能勘探开采非洲矿产资源,殖民政府能够为此提供安全与控制,而这是土著酋长们无法提供的,殖民政府还能对整个殖民地分配矿产收益。”^⑥因此,非洲人被剥夺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也无法从中获益,顶多是为矿山开采干些体力活。乔斯高原(Jos Plateau)的锡矿业所发生的情况,也发生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业,时至今日仍是如此。同样是由于英国公司的特权地位,另一家英国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在1937年获得尼日利亚全境内的石油开采权。^⑦当

① John Hatch, *Nigeria: A Histor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71, p. 121.

② Cf. M. S. Steyn, "Oil Politics in Ecuador and Nigeria: A Perspective from Environmental History on the Struggles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2003, p. 74.

③ P. D. Okonmah, "Right to Clean Environment: The Case for the People of the Oil-Producing Communities in Nigerian Delta,"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41, No. 1, 1997; Y. Omoregbe,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duction of Petroleum in Nigeria," *Journal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 1, No. 5, 1987.

④ Benjamin Obi Nwabueze,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Nigeria*, London: C. Hurst & Co., 1982, pp. 35-37.

⑤ See James H. Morrison, "Early Tin Production and Nigerian Labour on the Jos Plateau 1906-1921,"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2, 1977.

⑥ Ibid., p. 208.

⑦ See Bronwen Manby, *The Price of Oi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Nigeria's Oil Producing Communitie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p. 25.

前外国公司对于石油业的控制以及它们肆无忌惮的经营行为，这都要归咎于它们当初的特权地位以及它们在独立前与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尼日利亚政治精英将这一关系保持了下来，这既是尼日利亚能吸引外资的原因，同时也是其问题所在。奥卢费米·O. 阿莫 (Olufemi O. Amao) 等学者认为，在这些脆弱地区（如发展中国家），除非国内层面在“外资公司监管方面确立了最为基本的制度框架”，否则对于跨国公司企业的监督将是缺失的。^①

毫无疑问，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壳牌石油公司在欧洲之外的“大本营”。壳牌公司目前无可匹敌的“先驱优势” (first mover advantage)，主要得益于它所拥有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 15000 平方千米的土地使用权，因此竞争是几乎不存在的。^② 只是在壳牌石油公司牢牢站稳脚跟后，其他西方公司才被允许进来，即便如此也不是由于它的疏忽大意导致的。乔治·弗莱纳斯 (Jedrzej Georg Frynas) 等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希望“控制它对于殖民地的财政支出，从而确保政府预算和货币的稳定……这主要是由于英国国内严峻的经济局势”。^③ 我们可以看出，殖民管理者并没有突然变得慷慨，这全都是认真盘算好的。到 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时，壳牌石油公司又重新订立了土地出让协议，壳牌石油公司在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地区获得了至少 46 个石油矿区租约 (Oil Mining Lease)，为期 30 年至 40 年，这意味着壳牌公司不会受到后来进入者的冲击，^④ 后来者只能到那些条件更为艰苦、产出少得多的地区去。这一优势意味着，“取得许可证的过程以及壳牌石油公司在其中所起到的角色，这些都使得公司取得了最有发掘潜力地区的租约，从而避免了对手的竞争威胁，并能够维持着相对的优势地位”。^⑤ 由于壳牌石油公司的主要租约地在陆上而非近海，而这些地方当时是最适宜居住的地区，土地肥沃，河流密布。因此，当前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环境

① Olufemi O. Ama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Law in Nigeria: Controlling Multinationa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52, No. 1, 2008, p. 89.

② Jedrzej Georg Frynas, Matthias P. Beck, and Kamel Mellahi, "Maintaining Corporate Dominance after Decolonisation: The First Mover Advantage of Shell-Bp in Niger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 85, 2000, p. 411.

③ Ibid., p. 409.

④ Ibid., p. 411.

⑤ Ibid.

污染问题，恰恰是因为这离当地居民生活地区太近了。最适宜居住谋生的地方，竟然成了环境污染最为严重之地。

二 公司治下的尼日尔河三角洲

跨国公司的得名在于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因此，能够影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运。它们能够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为世界贸易组织设定议题，它们充分具备从尼日利亚石油出口中大捞一笔的财政力量和技术实力。这些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是无孔不入的。通过为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并将其主要的经济资源销售到国际市场，他们能够影响，甚至是主宰尼日利亚政府的经济政策。而面对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在贸易、投资、环境政策和工业标准等方面，实施自由化政策，这对于政府而言是难以抵制的诱惑。但是，除了融资方面的好处之外，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公司在履行法律规定责任方面表现得十分“滑头”。尼古拉·雅格（Nichola M. C. P. Jägers）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跨国公司同时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使得它们处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有效监管之外，因此很容易出现严重漏洞。”^①因此，在监管缺位情况下，公司几乎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在尼日利亚案例中，这些大公司与政府沆瀣一气，在大肆攫取资源财富的同时，却逃避相应的社会责任。

以上就是外部势力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的残酷现实，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监管能力较弱的国家。作为跨国的“个体”，外国公司凭借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网络，使其能够操纵甚至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它们在尼日利亚逍遥法外，严重践踏当地的人权和环境权，这在南部石油产区表现得尤为严重。例如，斯特拉·阿马蒂（Stella Amadi）等人的一项关于石油巨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在尼日利亚的经营活动的研究表明，利益攸关方对于国际石油公司的认知，“主要受到过去几十年里原油开采冶炼过程中所发生情况的影响”，阿马蒂等在讨

^① Nichola M. C. P. Jägers, *Corporat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In Search of Accountability*, Morsel: Intersentia, 2002, p. 11.

论环境恶化问题时指出,巨大的天然气和自然资源储备意味着采掘活动仍将长期持续,这些公司很少考虑环境补救措施,以尽可能减少对于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①

直至现在,改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社会状况的补救措施仍然乏善可陈。这一地区的民众仍然生活在沿河搭建的茅草棚屋里,大多靠着撑独木舟捕鱼为生。电力、清洁水源、道路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严重匮乏,使产妇和新生婴儿死亡率奇高,用 W. 阿德班伟 (W. Adebani) 的话讲,“这些地方的贫困,与他们土地下所埋藏的丰富财富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一财富被石油公司同它们的侨民以及尼日利亚职员所占有。”^②

(一) 政府俘获与阶级利益政治

之所以会出现上文所述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理论所描述的现象的存在。“政府俘获”主要是指,个人或群体控制了国家机器的主要部门,从而“‘俘获’矿产出口所获的租金或外来援助,通过腐败行径来维持特权地位,换言之,主要是通过运用操纵选举等方式来维持这种不平等。”^③显然,正是由于“政府俘获”的存在,所以缔造现代国家、塑造民族凝聚力的任务在尼日利亚是很难实现的。二十多年前,理查德·约瑟夫(Richard Joseph)指出:“国家面临着持续的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权力的碎片化或俸禄进贡化(prebendalizing)……在一定程度上,阶级利益的追求方式,将包括财富和权力斗争中对于族群象征和界限的强调。”^④

(二) 个人统治与尼日利亚精英的角色

与“政府俘获”相伴随的是个人统治现象,因此,我们说 20 世纪 60

① Stella Amadi, Mekonnen Germiso and Asle Henriksen, *Statoil in Nigeria: Transparency and Local Content*, Report No. 1, Oslo: Fellesrådet for Afrika, April 26, 2006, p. 40.

② W. Adebani, “Nigeria: Shell of a State,” *Dollars and Sense Magazine*, July/August 2001.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Africa/Nigeria_Shell_State.html [accessed 23/04/2011]

③ Richard Joseph,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al Governance in Nigeria: The Promise of an Obama Era,” Brookings, 2009. http://www.brookings.edu/speeches/2009/0521_nigeria_joseph.aspx (accessed 5/1/2011)

④ Richard Joseph, *Democracy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

年代中叶至 70 年代有抱负的精英阶层要为尼日利亚的发展失败负责。这一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管理着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与数任的独裁者合作，延续着个人统治。正如在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所发生的，个人统治构成了“个人意愿和活动的世界，与其说它是由制度或非个人化的社会力量，不如说是由个人权威和权力所塑造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系之中，政治生活为有权势者之间的竞争所左右，而不是由非人化的制度、意识形态、公共政策或阶级利益所决定。”^① 按照彼得·艾肯（Peter P. Ekeh）的观点，殖民主义者所培养的尼日利亚精英，认为自身对于两个公共领域负有“责任”：包含家庭、族系、部族和族群等在内的原始领域（primordial public）；由公务员、警察、军队和国营组织等殖民政府部门组成的公民领域（civic public）。^② 前者是由奉献与责任所构成的神圣道德范畴，相比之下，后者则是世俗的、道德无涉的世界，它是以权利积累而非责任履行为基础的。^③ 艾肯认为，“由非道德的机制化所导致的这一道德视角的双重性是殖民与后殖民时代核心的社会生存原则……这最初无法进行任何道德界定，现在仍是如此。”^④ 在这一环境中，政治变成了“垂直的个人庇护关系”，^⑤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区分也被消解为普遍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侏儒症”（dwarfism）。

经验表明，个人统治中的决策过程“时常是独断的、不透明的，统治者对于资源和制度的控制毫无约束可言。而且，公共和私人资源之间的区分显得无足轻重，因为领导人在利用、处置国家资源及提供就业机会和商业合同或者市场机会方面有着很大的操作空间。”^⑥ 因此，这一制度领

①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Personal Rul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6, No. 4, 1984, p. 421.

② Peter P.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7, No. 1, 1975, p. 92.

③ Robin Theobald, *Corruption,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90, p. 6.

④ Peter P. Ekeh, "Coloni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augural Lecture*, 5th June, 1980, University of Ibadan, 1983, p. 423.

⑤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Personal Rul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6, No. 4, 1984, p. 423.

⑥ Peter M. Lewis, *Growing Apart: Oil,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Indonesia and Nigeria*,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p. 65.

域并未成为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而是不断遭受着统治者及其侍从们的攻击。^① 这因而成为了腐败滋生之所。因此，尽管国家和社会的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行政和市场领域，仍然需要“第三方来遏制贪欲，推行规则，并引导合作行为”，^② 在这样的食利型国家，只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笔者看来，第三方主要是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共或政治制度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直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贾斯廷·林（Justin Yifu Lin）和杰弗里·纽金特（Jeffrey B. Nugent）将制度视做“一系列由人类所设计的行为规则，它决定并塑造着人类的相互交往关系，部分通过形成对于他人行为的期望。”^③ 似乎这一可预测性是形成目标以及设定社会和经济关系最终标准的关键。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作为责任的主权”可以用来描述国家作为人民保护者的角色。

三 作为责任的主权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是公共和社会决策的场所，决策关涉到民众生活中基本资源的分配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与18世纪之前破碎的西方社会有着显著差异，当时的资源分配方面的决定，基于国家对“富裕阶层和强大的民众群体利益的承诺……之所以穷人能够得以分享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实惠，主要是由于政治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政府关心所有人。”^④

① See Patrick Utomi, "Nigeria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Can It Be Achieved?"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rafting a New Nigeria: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Lond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p. 126 - 129.

② Peter M. Lewis, "Getting the Politics Right: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Failure in Nigeria,"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rafting a New Nigeria: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Lond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 105.

③ Justin Yifu Lin and Jeffrey B. Nugen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 Behrman and T. N. Srinivasan, ed., *Handbook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ress, 1995, pp. 2306 - 2307.

④ Meghnad Desai, "Public Good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Inge Kaul et al., eds.,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UNDP, 2003, p. 67.

现代主权观念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时代确定的,这一条约结束了长达30年的欧洲战争。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认为,“该文件确定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君王在国内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①在凶险的专制独裁环境下,君王需要与富人结成政治、社会和经济同盟,因为这些富人有能力确保他的统治权,包括免受外部干涉的威胁,而毫不关心对广大民众利益的保护。但是,随着民主观念的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如果国家希望被视做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一员,那么遵循“以人权和道德标准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原则”^②成为了普适标准。正是由于对这些道德标准的普遍接受,使得当前对于国内事务责任的理解,涵盖了保护其他公民利益的责任。因此,一个负责的国家需要约束权力以满足若干标准:禁止严刑拷打;不容忍残暴统治;不得剥夺私人财产;反对国家恐怖统治;不允许以种族、宗教或性别为基础的歧视;不得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等等。^③

四 作为新商业关系基本法则的鲁杰原则

笔者在讨论中不断提到,一般普通民众会认为,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国家和石油公司的关系过于亲密,因此,阻碍了国家有效履行作为公民保护者的角色。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在尼日利亚这样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只有石油公司才是政府唯一的税收来源。这一脆弱性向外国公司传递着一个错误信号,它们会认为自己可以肆意凌驾于法律之上,置当地民众人权于不顾。鲁杰原则(Ruggie Principle)是一个创举,因为它实现了国家和公司之间的分割,这一框架下的国家是一个整体的,从而有效保护自己的民众。鲁杰认为这一框架有三个支柱:

“首先,国家有责任通过适当的政策法规,来保护本国民众免受包括

① Francis M. De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in Adekeye Adebajo, ed., *From Global Apartheid to Global Village: Af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cottsvill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9, p. 192.

② Ibid.

③ W. Michael Reisman, “Through or Despite Governments: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in Human Rights Programmes,” *Iowa Law Review* 72, 1987, p. 391, cited in Deng, p. 195.

公司企业在内的第三方侵犯人权行径的危害。其次，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这意味着企业公司应避免侵犯他人的利益，并消除自己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最后，确保受害者能够通过司法及以外的途径迅速地寻求补偿。在这样一个由预防性、补救措施构成的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中，每一支柱都是基本的：首先，国家担负保护的责任，因为这是国际人权体制的基本核心。其次，企业的保护责任是因为这是社会对于企业在人权方面的基本期待。最后，诉诸补救措施，是因为即便协调一致的努力，仍然难以避免侵权事件的发生。”^①

笔者坚信，只要尼日利亚政府拥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它是能够使石油公司为自己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些外国公司也有尊重当地法律的意愿，然而，在政府与外国公司共同组建的联合企业中，政府通常为了赚钱而忽视了人权问题。

在国际人权法中，单个的国家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而不同的国家共同构成了国际人权机制的受托人。如果企业是由国家控制的，那么企业的侵犯人权行为会对于国家自身的国际法责任构成挑战。而且，公司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越是紧密，或者它越是依赖于法令权威或税收支持，那么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就有赖于确保企业尊重人权。^②

鲁杰原则也要求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来履行责任，“尊重人权是所有企业都应该遵守的全球标准。它独立于国家履行自己的人权责任的能力或意愿之外，也并未消除这些责任。它应当遵照当地保护人权方面的法律法规。”^③

结 语

人们时常讲，相比于尼日利亚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更具备消除贫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然而，可悲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可能是机会丧失得最惨的一代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人人过上更好生活的

①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2011. p. 7.

② Ibid.

③ Ibid., p. 13.

期盼，仍然是遥不可及的。这不是因为资源或善意的缺失，而是因为经济掌控者所遵循的一系列规则，是迥异于全球准则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表明原本应充当民众保护者的国家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使得民众感觉被国家边缘化了。不过，我们将看到新希望，因为联合国下属机构首次发表了一系列新的《企业和人权准则》，用以消除企业经营活动在人权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原则来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那么情况将出现很大改观。随着人们逐渐了解鲁杰原则，它将逐渐成为解决被剥夺群体或个人的人权问题的基本准则。

（李鹏涛译）

（责任编辑：赵俊）

sifying energy import and expanding overseas market, has caus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China's interests in Africa, namely while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traditional interests of achieving political ends, China looks the economic interests as an important goal to improve Sino-African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various reasons, China's interests in Africa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This paper aims to elucidate such questions as what are China's interests in Africa, what threats are these interests facing, and what measures should China take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in Africa.

Key words: China; Africa; interest; protection

Analysis of New South Africa Foreign Policy

Fang Wei, PhD Candidate of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in adjustment and continues to mature since its rebirth in 1994, "Six Principles of the South Afric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Mandela's government to reshape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successfully retur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rican Renaissance" thinking of the Mbeki's government mad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successfully returning to Africa; Zuma's government wants to implement "multilateral foreign policy" to make the South Africa become the leader of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has a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mportant practical motivation, it also related to South Africa's historical tradition which wants to achieve its Political Ambition.

Key words: South Africa; Foreign Policy; African Renaissance; Political Ambition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in the Light of the Ruggie Principles: Setting a new Agenda for Secu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the Case of Nigeria's Niger Delta Region

Edward Osang Obi,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Social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SCR), Port Harcourt, Nigeria.

Abstract: The present devas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social dysfunction of the Niger Delta region is a direct result of corporate advantage over the numerous indigenous ethno-linguistic groups in the area. This advantage has been aided by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regulative grit from the state institutions charged with providing them. Ruggie Principles are innovative in that they come between state and the corporations in a framework that gets the state to act as one, so as to prevent and address the risk of adverse impacts on human rights linked to business activity, and in defense of its people.

Key words: Nigeria; Niger Delta; Ruggie Principle

Chinese investment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political risk: the ongoing debate in China

Serena Belligoli,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Louvain la Neuve, Belgium.

Abstract: The recent turmoil in North African and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s, at various degrees, affected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 as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citizens abroad. This discussion paper does aim to illustrate the major aspects and to stimulate the ongoing debate on risk assessment practices of Chinese firms investing in Africa. In this brief discussion paper, I tried to define what political risk is and how Chinese firms investing abroad are dealing with it so far, pointing out possible shortcomings in their approach, mainly due to lack of financial means and lack of expertise. I tried to illustrate how the recent North African turmoil and the Libyan events in particular, have affected visions and perceptions of officials from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of officials from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Key Words: China; Africa; investment; political risk; debate

China-Egypt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status quo,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